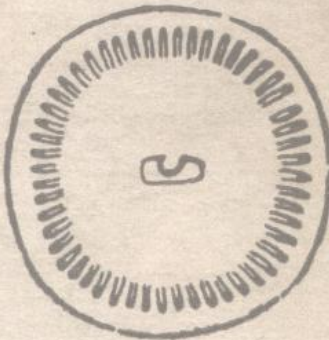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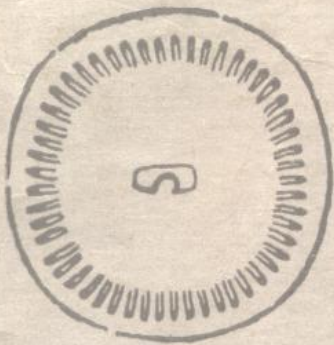


考|古|学

文|化|论|集

苏秉琦 主编



文物出版社

考古学文化论集

(一)

苏秉琦 主编

DB07/32



文物出版社



1151733

本集执行主编 张忠培
责任编辑 童明康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考古学文化论集

(一)

苏秉琦 主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北京德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19.5 插页：3

ISBN 7—5010—0036—0/K·14

统一书号：11068·1626 定价：5.10元

编 者 的 话

这是一种将连续出版的考古学论文集，各集由许多同志自己选题写作或翻译外国著述，内容比较分散，但每集大致有一个重心。编辑这种论文集的愿望，七十年代末已经出现，因为无论是社会的需要还是我国考古学资料的积累和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在当时都进入一个新阶段，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这个学科当前的使命，设计加快学科进步的最佳方案。要达到这个目标，当然不是编辑出版一种论文集就能完成的，但即使只能起一点点作用，也算对这个伟大的时代，尽了自己的一些义务。

出现这种愿望的基础，主要是以下三点认识。

一 变革的时代，变革的学科

所有学科的存在，都离不开社会的客观需要；学科内容的合理性，也在于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来自时代的需要。

在国际范围内，近代考古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在这个时代，伴随着地理新发现以后的到处开拓，人们已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社会思潮的活跃更使人们奋力寻找真理而充满着探索激情。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在这个时代，牛顿定律、宇宙守恒原理和达尔文学说产生在这个时代，近代考古学等也产生在这个时代。寻找一种认识世界的新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正弥漫于那个时代。

这种时代精神，当时的一位英国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思 (John Evans) 曾说得很清楚。在介绍伊文思的这个说法时，应当先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化论学说和近代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是息息相通的。所以，1848年时，《共产党宣言》发表；1859年时，《物种起源》出版；同年，因在法国北部阿布维利山洞中证实了旧石器时代的存在，使得近代考古学的产生达到了一个转折阶段。当伊文思和一位地质学家约瑟夫·发利斯特维治 (Joseph Prestwich) 证实了旧石器时代存在时，正值《物种起源》发表，伊文思发表评论说：“确立旧石器时代有人们存在……摧毁了基督教堂和大学里的习惯的年代学，它给人类的眼界带来了一个关于宇宙的新的均衡，与这种均衡的改变可以比拟的

仅仅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关于新世界的发现。没有一个历史新文化或近代历史时期的发现可以在科学上和哲学上得到如此巨大的反映；为了建立第四纪时期存在着人类的学说，就要牵涉到重定基本原理的方向……而这种原理是属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伊文思所说的“重定基本原理”，也就是寻找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基本原理。显然，发生这种精神的社会需要，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时代背景，而正是因为这种时代精神，促使上述一系列新学说出现了。

本世纪初，我国也出现了一个迫切要求进行变革的社会需要和时代精神。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随之而来的二十年代，正是一个思想活跃、富于变革精神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这个时代；“中央研究院”等科学机构的创建，在这个时代；一批新的、有雄心壮志、救国救民并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出现在这个时代；我国的近代考古学，也开始在这个时代奠基。显然，我国同欧洲一样，近代考古学的出现，都是因为要变革当时社会的时代需要。

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又进入一个新的变革的时代，新思想活跃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进行改革，一系列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在内，无疑亦将引起变革。在这种形势中，我们当然应该考虑考古学将会发生什么变革？哪些变革是合理的？

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因为积累和整理材料所占的工作比重很大，长期以来，我们容易看不清楚学科理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其实，任何学科的具体实践，都是在这种或那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工作实践的具体收获却又因指导理论的差别而有所不同。所以，为适应变革时代需要而发生的学科变革，必将以学科理论的变革为标志。我们必须真正重视理论探索，而这种探索如果想得到成功，又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地概括新理论、新概念。从我国当前的考古实践出发来进行理论概括和探索，那怕暂时还是较低层次的概括和探索，也都是极有意义、不容忽视的，这也是这种论文集的编辑原则之一。

二 我们面临的选择

回顾六十多年来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历史过程，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可以说是起步阶段。二十年代发现了仰韶文化，三十年代梁思永发现了后岗三叠层，古文字的研究也从罗（雪堂）王（观堂）到了郭（鼎堂）董（彦堂），新出现的近代考古学已成为独立的学科，二十年的时间，走了欧洲半个多世纪才走完的道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建立后，时代变了。学科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摸索新道路。

开始是学习苏联，似乎并不理想。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释考古材料自然是应

当的，可那时又常像穿靴戴帽，终是不能深入肤理。

记得1955/1956学年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学对专业课教学中“见物不见人”提出尖锐批评，使全体教师震动。直至今日我对此事记忆犹新。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思考，如何才能把唯物辩证法渗透到学科，这不正是当代中国考古学者面临的选择吗？三十几年过去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究竟从原来的出发点走出多远？“振兴中华”是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强音，旧问题结合新情况，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又一次选择。

新情况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从定性、定量概念出发，把一种考古学文化当作社会有机体，研究它们发展的全过程；第二，从“区系类型”角度研究考古学诸文化的内部与外部关系，探索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第三，纵观自农业起源以来的一万余年间中华大地文化发展，在距今五千年左右是最关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当前考古学最重要的课题。

我们今天的社会活动及其业绩就是创造中的明天的历史。让我借用近人这样一句哲理名言“理有固然，事无必至”（金岳霖）来说明：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理有固然），创造中的明天的历史则有许多偶然性。现实可能性的多样与主观能动性的互相作用，是人们的社会活动有选择余地的客观条件。实际情况与社会需要是人们论证选择的或优或劣的科学依据。为了科学的繁荣发展，要求我们今天的工作能按最佳方案进行。而最佳方案的取得有赖于在实践中探索。这也是这种论文集所致力的一个方面。

三 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使具有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派成为现实

对考古学性质与任务的规定，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看法。

对中国考古学的要求，今天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任何学科的性质、任务与要求，都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们只能尽可能准确地规定当前中国考古学的性质、任务与目的。

就考古学的性质与任务来说，它与普通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性质与任务，至少是存在着许多交错点；就其认识人类的过去进程和预测今后发展方向而言，甚至是一致的。这三个学科各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因此，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无疑是三个学科的共同责任。

自考古学和民族学已分化成独立学科后，把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的工作，在欧洲，至迟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开始；在我国，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也不断有人进行。但三者的全面结合程度，至今仍有相当距离。

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要求，三十年以前已经出现，也不断有人为此而作出努力。但大家至今仍感还有相当距离。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过去，当如何从具体的中国考古材料出发而作出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分析方法还在捉摸不定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要求，只能是一句口号，也不可能把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民族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今天，当通过考古材料了解我国古文化的具体进程和具体探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等问题已成为现实的研究课题之后，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已从理想接近现实；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了。

正像前述第一认识所说，考古学史的本身已说明这个学科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今天，我国的时代精神是认识中华，振兴中华。认识中华古文化、古文明的辩证发展，认识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自然是认识中华、振兴中华的有机组成部份，也就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的时代精神。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方向，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初的几十年时间内，只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为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前景而取得突破性的重大发展，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这种论文集的问世，就是希望有一批人为实现这个前景而作出的努力。

苏秉琦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

编者的话

- 1 -

八	胶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	吴汝祚 (156)
九	从地形变化和地理分布观察山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	巫 鸿 (165)
一〇	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	何介钧 (181)
一一	寿县朱家集铜器群研究·····	曹淑琴 殷玮璋 (199)
一二	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	潘其风 (221)
一三	试论萨玛拉文化·····	杨建华 (233)
一四	西亚、北非、东南欧新石器时代发现与研究的进展 ——介绍《近东新石器时代》·····	华 泉 (276)
	做考古学新时期的开拓者 ·····	苏秉琦 (297)

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

俞伟超

一 “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在我国的运用

任何学科，都会有自己本身的方法论。对于考古学来说，除了需要有人文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和若干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外，还应该有自己的特殊的、其它学科没有的方法论，否则这个学科就不会独立出来。考古学的方法论，最基本的有哪些，当然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自己理解，好象有三个：一个是地层学，一个是类型学。把地层学和类型学看作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方法论，目前在我国是比较普遍的认识；过去，我自己也是这样看的。但后来和一些朋友交换了意见，觉得还应该增加另外一种方法论。它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总的内容就是根据实物资料来恢复历史原貌。这样，地层学、类型学以及透过实物资料来了解历史原貌这三种方法论，便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方法论；其中，地层学是最基础的。

大家知道，考古学这个名词，在西方出现于古希腊时代；在我国，到北宋时期方出现“考古”这一名词。但我们现在所讲的考古学，跟古希腊时代和北宋时期所谓的“考古”有很大区别。现在讲的考古学，是一种近代考古学，英文中通常叫做Modern Archaeology，直译过来，也可以叫做现代考古学，这种近代考古学，是以野外工作为取得基础资料的主要手段，所以又常常称为田野考古学。

一种新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必须具有两方面的条件：一是随着生产扩大和复杂化后人们认识宇宙能力的提高，二是有新的社会需要作为强大的推动力。在欧洲，当文艺复兴来到后，新兴资产阶级随着地理新发现而把眼界扩大到美洲以及亚洲，等到大工业出现后又引起一系列近代科学的发展。他们为了推倒中世纪的黑暗制度，又追求希腊、罗马这种古典时代的民主和人本主义精神，于是，从十五世纪后叶起，首先在意大利半岛，随后又扩大到法国等地，掀起了搜集古代罗马艺术品的热潮，到十八世纪中叶后，又进而搜集古希腊的艺术品。正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下，美术考古首先发生起来，这是近

代考古学出现的一个源头。另一方面，欧洲大陆本身又不断出现石器、青铜工具和装饰品等古物，并不断有人发现古迹。到十九世纪前叶，丹麦考古学家裘琴逊·汤姆逊（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 1788—1865）发现人类曾经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近代考古学终于逐渐形成了。但在这种形成阶段进行的野外工作，并不懂层位关系的重要性。西方的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真正开始，应当从舍利曼（Dr. Schliemann）根据地层学原理发掘特洛伊（Troy）古城算起。可见，如果把野外工作当成近代考古学的特点来看待，地层学的运用则应当是近代考古学走向成熟的一大标志。

地层学是在地质学中首先发生、后来才引进到考古学里面来的。考古学中所应用的地层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同地质学中地层学的最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但有其自身特点。为了区别两种地层学，这一种似可叫做“考古地层学”。考古学中的这种方法论，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逐渐从地质学中引入而逐步发展的，为了说明这种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应用方法，应当先讲一点它的成长史。

以野外工作为主要特点的近代考古学，在欧洲，于十五世纪萌芽。例如在英国，从那时起，便有一些历史学家或旅行家，在自己的旅途中记录一些他所看见的古迹、古物。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也有某些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旅行家记录古迹的行为。这到北魏酈道元著《水经注》时已经很突出了，后来，并一直继续不断。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工作看成是我国考古学的直接前身，因为我国的近代考古学并不是由这个途径直线发展而成的。欧洲的近代考古学则是从这种工作发端，再结合其它学科的方法而成长起来的。如在英国，当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就有伊文·威廉（Even William, 1551—1626）从这个道路创立了不列颠考古学。但这阶段的考古学，在现代考古学家的眼里，还是属于一种推理性质的、有科学性以前的学问。所谓推理性质的，即指他们看见了一些古迹后，往往按照史籍中的某些记载，牵强附会地加以对应。譬如伊文·威廉，即把英国青铜时代的一些巨石遗迹，比附为恺撒军事征服过程中留下的堡垒或临时的扎营，这跟实际情况出入太大了。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推理性质的考古学，在欧洲继续了三百年左右。

到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英国绅士麦克·埃尼莱（Mac Enery）曾在靠近托夸（Torquay）之地的肯特山洞（Kent's caven）中找到一些燧石工具和猛犸及另一些现已灭绝的动物骨骼共存，也就是找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此时，欧洲的宗教信仰残余仍很严重，按照这种信仰，根本不能存在什么旧石器时代。麦克·埃尼莱是基督教徒，不愿因此引起个人声誉上的危险，没有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宣布其发现权，这个荣誉就归之于同时代的一个法国人布恰尔·第·波赛斯（Boucher de Perth, 1788—1868）。他于1836—

1837年在索米山谷 (Somme Valley) 的一个山洞里, 找到了燧石工具碎片、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斧和史前时期的破碎的骨骼, 并于次年举行展览, 公布了这一发现。1938年, 他又在法国北部的有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阿布维利 (Abbeville) 得到了粗糙的燧石工具与现已灭种的动物的骨骼。这些发现, 唤醒了英国的同行。于是, 在1859年, 一个由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组成的非官方的调查考察团, 亦去阿布维利, 在一个地层未被扰乱的山洞中, 找到了燧石手斧等旧石器时代遗存。在这个考察团中, 考古学的代表是约翰·伊文思爵士 (Sir John Evans), 地质学的代表是约瑟夫·泼利斯特维治爵士 (Sir Joseph Prestwich)。发现物的年代是由地质学家决定的。他们证明了以前波赛斯的发现是可靠的。

在人类历史上发现旧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和地质学相结合的结果, 而这又标志着考古学的一个巨大转折。那时, 要确定旧石器遗存的年代, 只有地质学才有能力, 因为在地质学中已经建立起了地层学。

地层学并不是早已发生的。在十八世纪末期, 地质学家威廉·史密斯 (William Smith, 1769—1839) 曾根据自己的一系列观察, 为建立一连串的地层系列作了准备。到十九世纪早期, 他又进一步证实这种地层系列可以表明年代, 根据是不同地层里的不同化石。到1830—1833年, 查尔斯·李耳 (Charles Lyell) 发表《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 标志着地层学已成熟。地质学里的地层学既然可用来判断地球历史的进程, 当它同考古学一相结合, 自然可发现若干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存在。当时, 神学仍在历史年代学中占有统治地位, 这种发现及其科学论证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 是极为巨大的。

十九世纪中期正是人类智能取得重大发展的伟大时代。近代科学的三大发现和田野考古学乃至共产主义学说就都是发生在这个时刻, 它们之间又是互有影响的。如李耳的贡献, 便对达尔文发生直接影响; 而达尔文的理论和确认旧石器时代的存在, 又是息息相关的。非常凑巧, 伊文思和泼利斯特维治发现属于猿人时期的阿布维利遗存和达尔文的发表《物种起源》, 都在1859年。显然正因理论上的密切关系, 当《物种起源》出版后, 约翰·伊文思便作出如下反映:

“确立旧石器时代有人们存在 (的贡献) ……莫过于为人类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它增加了时间的巨大范围, 而对这个时期, 最大量的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是必须思索的; 它摧毁了基督教堂和大学里的习惯的年代学; 它给人类的眼界带来了一个关于宇宙的新的均衡, 与这种均衡的改变可以比拟的仅仅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关于新世界的发现。没有 (另外的) 一个历史新文化或近历史时期的发现可以在科学和哲学上得到如此巨大的反响; 为建立第四纪时期存在着人类的学说, 就要牵涉到重定

（衡量世界的）基本原理的方向。伊文思和泼利斯特维治证明布恰尔·第·波赛斯1833年的发现是正确的，它延伸了人们在地球上居住的时间，而这种原理是属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它可一直运用到智人（Homo Sapients）。”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产生，是科学进步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层学的建立、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也都是这个总体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彼此又是密切相关的。这犹如达尔文的学说，当然是生物学的，可是它对哲学、史学、人类学产生的影响，乃至对社会总体发生的作用，也是同样巨大的。就达尔文的工作本身来说，几乎也可说是一种地质学工作，所以《物种起源》一书中，有两章便是纯地质学的。可以看到，没有地层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不能建立起来的。这就意味着地层学建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地质学本身的范畴，而且还对生物学、考古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的前进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许多学科本是互相联系着的角度来思考，十九世纪中期人们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划时代进步中，近代考古学的产生是有其重要位置的，因为只有通过这个学科产生后才能得到或证实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新认识，又为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包括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准备了一个新的基础。所以，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确是人类知识发展中一个有关大局的部分。由于它的出现是许多其它学科的发展促成的，而地层学的建立有其直接作用，所以许多人就把这两个学科开始紧密结合的1859年，看作是考古学得到重要发展的转折点。

但还不能认为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此时已真正引进到考古学里面来了，因为对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各遗存的发掘工作来说，不能简单地搬用地质学中的地层学，而是必须建立自身的地层学理论与方法。在考古学史上，第一次考虑到发掘时应注意地层关系的是后来曾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Tomas Jefferson, 1743—1826）。他于1784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发掘一个印第安人墓葬时，已提出了这个看法。不过，在考古发掘中真正实行这种想法的，则要迟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舍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发掘特洛伊（Troy）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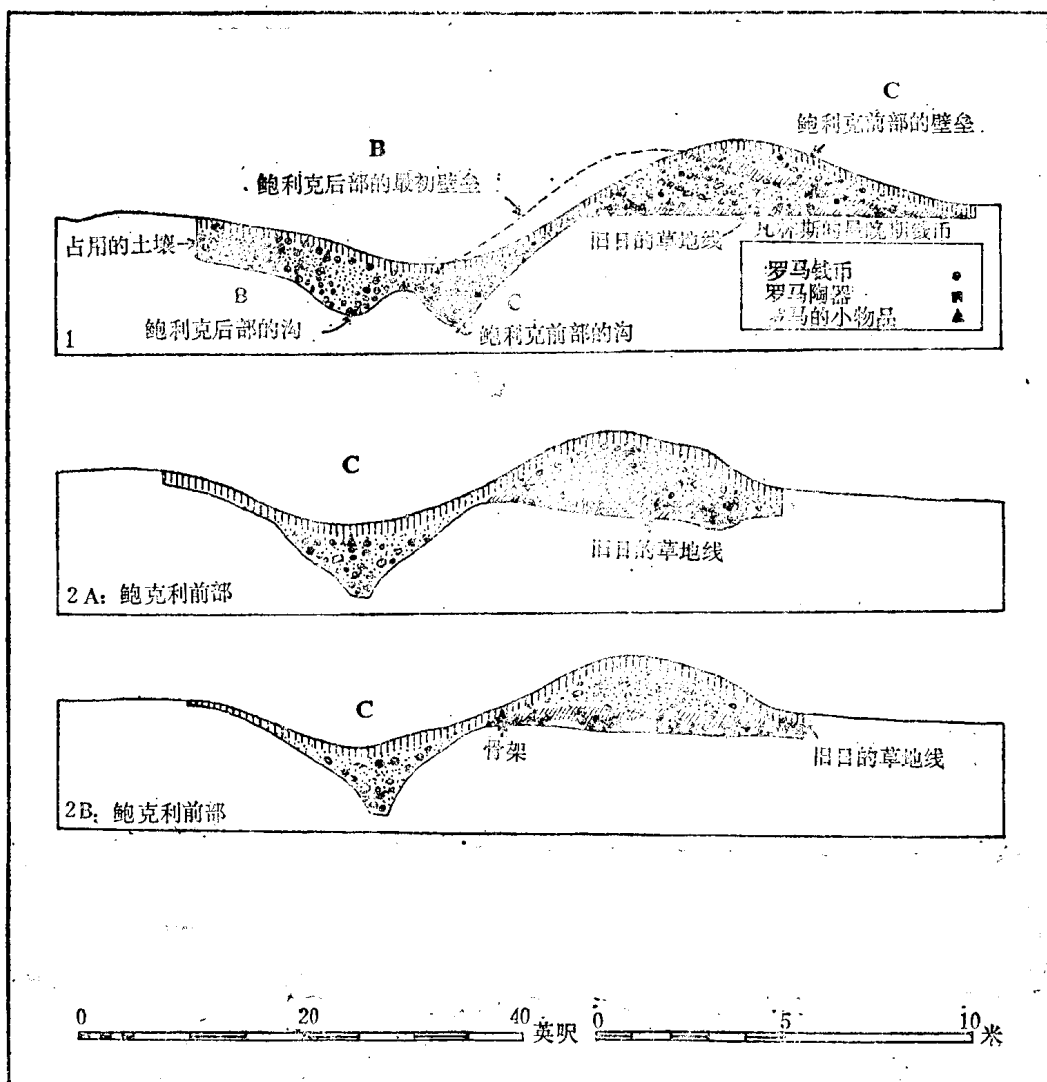
舍利曼本是德国商人，少年时在他父亲送给的圣诞礼物——乔利的《通史》（Jarrer's "Universal History"）中看到一幅特洛伊的想像图，引起很大兴趣，后来又读了荷马的《史诗》，多年以来就渴望找到《伊利亚特》中讲到的特洛伊古城。四十六岁后便改搞考古，终于找到了这个古城，并于1871—1873、1879、1882—1883作了三次发掘，开始按地层堆积来进行工作。在此以前的许多发掘，例如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些法国、英国的贵族，假日期间常到野外挖掘古墓，便根本不顾层次，也不作有比例的实测图，而只绘过一些素描式的图。舍利曼则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发掘，并按一定比例作图。他在工作日记中说，发掘者的首要任务是看地层。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舍利曼的工

作，当然还很原始，但毕竟开始了野外发掘方法的新阶段。所以，本世纪上半叶时，牛津大学的一位长寿的、资历极深的赛思（A.H.Sayce）教授，死前曾对英国的另一名考古学家，即为考古学中利用航空摄影作过很大贡献的格莱福特（O.G.S.Gawford, 1886—1957）说：近代考古学是“伴随着舍利曼开始的”。赛思本人经历了从阿布维利遗存到乌尔（Ur）王陵的发现，非常了解十九世纪后半期至本世纪初期考古学舞台上那些主角的活动情况，这个评论当深切实情。

舍利曼找到的特洛伊古城虽曾长期失踪，但总是在历史记载中留下过痕迹。不久后，随着考古方法的进步，人们又可以通过发掘而对从未见诸史籍的一些遗址，重建其比较具体的历史，曾大规模进行这种工作并取得很大成就的是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费林德斯·彼特里（Flinders Petrie, 1853—1942）。他使用一种建立陶器年代系列的方法，发现了一个毫无历史记载的埃及的“前王朝时期”。彼特里的学生，又把这种重建的历史的年代，推得更早。彼特里对考古学的贡献有很多方面，在改进考古发掘方法方面，最重要的是更注意发现细节，并尽一切可能来记录发现的各种情况。他认为发掘可以重现古代现象，也可能毁掉这些现象，所以说，“经过发掘之后，被发现的遗存，只存在于纸上，一个考古学者的义务，就是要记录考古发掘中所见的一切东西，因为以后只能依靠记录，才能凭想像去重建那个遗存和使过去的那些生活具体化起来。考古学的全部事业，就是重建已经消逝的生活。”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般名言。一个考古发掘者，的确应把尽可能记录一切现象当作自己的职业道德。

在考古发掘中应用地层学原理，并且绘制有比例的平面图、剖面图来记录层位这种方法，要到上世纪末才真正成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毕德·里浮斯将军（General Pitt-Rivers）曾举出证据，明确说明在各个遗址里发现的物品不是游离的。这个思想说明了同一层位出土物的共存关系的要义。他说：“在一个地方的田野里找到了一枚罗马钱币，只能说明一个穿着罗马短袖宽袍衣服的人的口袋有一个洞；而如果在鲍克利·第基（Bokerley Deke）的一个未被扰乱的壁垒的下面找到一枚罗马钱币，就能说明壁垒是晚于这个钱币才建立的，因此，壁垒的年代一定是罗马的或者再晚一些的。”

毕德·里浮斯的突出功绩，就是更清楚地指出了地层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判断相对年代的重要性。他的那张鲍克利·第基的壁垒下有罗马钱币的断面图（图一），是表示考古地层学已经基本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记录。可以说，伊文思和泼利斯特维治发现旧石器遗存，还是根据地质学里的地层学方法来断定年代的，而要判断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地层关系，因堆积的成因和具体情况不大一样，观察和处理方法要细致的多，必须另建考古学自身特有的地层学。建立考古地层学的过程，如果从波赛斯和伊文思的发现算起，到毕德·里浮斯之时，大约经历了六十年左右；而它在欧洲的被普遍确认，则要



图一 鲍克利壁垒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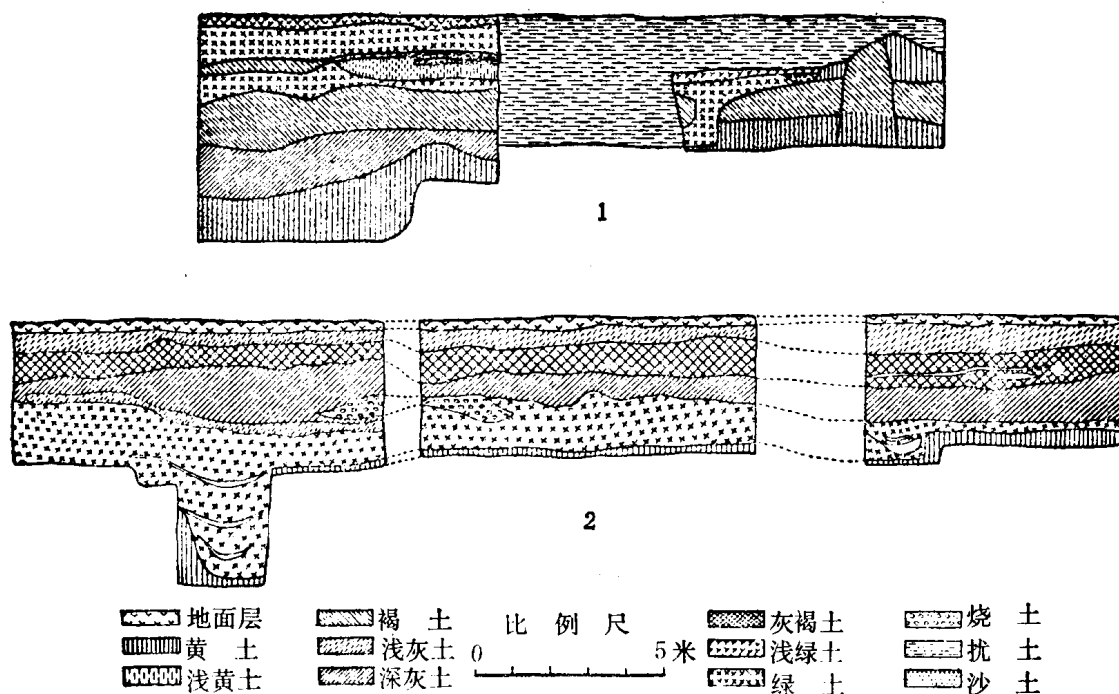
迟至本世纪初。

我国的考古地层学，是从美国、法国和英国那里引入的。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新疆做过发掘。在那种沙漠地带，层位关系很难辨认，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还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安特生本是地质学家，在发掘时，就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河南龙山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

由我国学者自己进行的野外考古，始于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1928年以后，在李济主持下，安阳殷墟的发掘也开始了。李济先生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但他毕竟不是专攻考古学的，所以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并未严格按地层学要求来进行工作。1930年梁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1931年主持安阳后岗发掘，发现了仰韶、（河南）龙山和小屯的三叠层（图二），知道小屯的殷代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河南）龙山又晚于仰韶。以后，他主持了殷墟的发掘，就真正按照地层学原理来进行工作。任何学科的新方法的运用，总是不平衡的；我国考古发掘中对于地层学方法的运用，也是不平衡的。但从梁思永先生发现后岗三叠层和主持殷墟发掘之后，考古发掘必须划分地层那种认识，在我国的考古工作中便占有了主导地位。因此，尽管今天看后岗三叠层剖面图，还存在着诸如一层褐土和一堆烧土叠压在绿土之上而又被绿土所压那种缺点，由于梁思永先生清楚地根据地层叠压关系来论证了仰韶、（河南）龙山和殷代遗存的早晚关系，应作为考古地层学已在我国确立的标志。

四十年代时，夏鼐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来，到甘肃进行考古，在临洮寺洼山的齐家墓葬的填土中发现彩陶片，便依地层学原理，订正了安特生的六期说，把仰韶、半山的年代放在齐家之前。到五十年代后，夏鼐先生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图二 后岗三叠层剖面图（选自《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1. 后岗第283、284两坑纵截面（东墙） 2. 后岗第241、243、244三坑纵截面（东墙）

所的工作，并且曾对北大考古专业和四届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过田野考古方法，一直坚持强调地层学的重要性，曾对我国广大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工作中重视地层学的应用，起了很大作用。

在我国，如果从梁思永先生发现后岗三叠层和主持殷墟的发掘开始计算，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考古发掘是极其大量的，对地层学的认识和运用，也在不断进步。例如在五十年代进行了半坡发掘之后，便日益注意在大面积发掘中，仔细分辨不同层位的成群遗迹。又如在七十年代进行了盘龙城发掘之后，在大规模发掘中，已愈来愈重视统一地层编号的工作。对于地层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现在也有更多的人来进行讨论以求其准确、深化和发展。从我国古代遗址的本身来看，如果同西亚、欧洲、美洲等地的遗址相比，至少是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颇具自身特点。西亚、欧洲、美洲等地的古代遗址，颇多石头建筑，那种遗址可以说是一种硬遗址；而我国古代，则流行土木建筑，形成一种软遗址。发掘硬遗址和发掘软遗址所要求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当然不完全一样。近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发掘软遗址的经验，并逐步得到一些有关考古地层学原理的新认识。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为考古地层学的前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及时汲取国际上关于考古地层学原理和实践经验的新认识，更好地提高我国的田野考古水平。

二 “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

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就最基本的原理而言，同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一样的。不过，地质学中的地层学，目的是研究地球形成历史，其资料是由各种岩石形成的一连串地层系列，形成原因是因自然力量的作用。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则是研究人类出现以后，主要因人为力量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的形成过程和原因，它是科学地取得考古资料的理论基础。两种地层的形成原因不一，内涵和存在形式不同，因而观察和分析地层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此外，考古学中的地层学，还包括了一种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所没有的内容，即除了观察、分析各种地层的形成过程和解释形成原因外，还要拿这种理解来指导发掘工作，处理各层次的遗迹。

从总的方面讲，地球岩石的不同层次，或因岩浆喷发而突然形成，有的则经过很长很长时间才形成，其空间范围（无论是广度或厚度）都是很大很大的。并且，地球上各种岩石的层次，因各种引力作用，可以发生大面积的升降、断裂、移动。这样，有许多本是连成一体的同一地层会分裂开，出现相错现象；原是同一水平的岩石层次，也会上下错离很远。由人为力量而形成的文化层，则面积要小得多。同一地点不同时期形成的